

绪 论

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

一、人是现代化的核心

自 19 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以来，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封闭发展的格局被打破，中国被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此，中国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漫长、艰难和曲折是举世罕见的，至今，这个过程仍在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无数的先驱者和知识分子为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上下求索，呕心沥血，甚至牺牲生命，至今翻检历史，仍可见其中斑斑心痕。

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而同步进行的。现代化意味着效率的提高、物质财富的丰富以及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结构合理化与理性化，同时，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离开人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没有支撑点，人是现代化的核心，社会是现代化的架构。总之，现代化是深刻的也是全方位的，任何一种片面的现代化观点，都是跛足的，也是不成立的。

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后发型的现代化，也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多次的内忧外患常常导致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断裂乃至反动。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由浅入深的过程。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维新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惊了昏睡的中国，使一些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看到中国之所以战败是武器不如人，于是开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办洋务以制洋人”；“甲午海战”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日两国长期以来的强弱格局从此逆转。于是进而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强”；而维新运动的失败，使五四运动的先驱者看到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指出“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于是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意在用新文化塑造新人，通过新人来建造新社会。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因袭的重负和传统保守势力的强大，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始终艰难困顿。

以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再度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20 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逐步汇入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从经济到社会、到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疑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当我们步入这现代化的潮流之中时，当我们在努力追赶世界现代化的目标时，由于种种传统的、历史的惰性，我们又时时感到步履蹒跚、沉重，受到许多人为的制肘，放不开手脚。许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争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以新的形式纠缠不休：从深圳改革开放的“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曲折经历，到全国大规模“姓资姓社”的争论，都使我们感到，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来自自身内部，更是来自于观念的陈旧与保守。

人，是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也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具有不同的文化素质的人，可以建构出不同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样的地理资源条件，印第安文化产生的是原始落后的部落社会，依赖刀耕火种渔猎为生；而欧洲移民则在那建立了新型的工业现代社会。以色列建国不久，便在那极其缺水和贫脊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强盛的、高效率 and 法治的国家。他们的科技成果和科技水平堪称世界一流，他们国土的

土地气候资源条件远不如我国，但他们的农业生产却搞得非常好。他们用电脑控制灌溉，发明了滴灌法，农业产值相当高，这一切依靠的便是它高素质的国民。而我们却饱受土地沙漠化、黄河断流、缺水干旱和水灾之苦，一方面是缺水，另一方面却是水资源的大量浪费，在我们许多缺水的省份，农田灌溉仍然沿用大片排灌的方式，这里面就体现了一个国民素质的问题。关于人的素质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已为世界各国及其不同的历史所证明，对此，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在探讨了人的现代化对社会的现代化的重要性之后，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指出：经济学家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现代性，政治家以有效的管理制度机构来衡量现代性。我们的意见是：如果在国民性之中没有我们确认现代的那种素质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快速的经济增长还是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不会维持太久。在当代世界情况下，个人现代性素质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它们不是派生于制度现代化过程的边际收益，而是这些制度得以长期成功运转的先决条件。现代人素质在国民之中的广为散布，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本身的基本因素。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亚洲神话”的破灭，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他的这些看法，“东南亚的危机”说明，缺乏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和现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光靠引进外资、经济扩张的方式最终还是无法实现社会的现代化的。

二、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是现代化的核心，而人的现代性的增长和现代化的实现，又需要社会现代化架构予以保障。因此，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互动促进的过程。现代化的发展是一股全球的趋势，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必将或迟或早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那么，现代社会具有

哪些基本特征呢？我以为现代社会包含着不同层次和方面的特征，简而言之，是个人生活目的明确和直接化，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化以及社会政治关系的合理化，是人的观念、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的政治制度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我们固然可以用各种指标去衡量它，如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城市化程度……但现代化国家，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它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

(1) 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个人是一种和社会、群体相对立的概念，是贬义词。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社会、以群体为本位的，个人被淹没于整体和社会之中，个人只有被规定为社会中的某种角色才被体现出来，而个人本身的价值、地位、尊严是无足轻重的，这样个人人生的全部丰富性就被压榨、挤干了。人成了单面性的人，成了整体中的一部分，成了整体主义机器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这种整体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相联系，在黑格尔哲学里，国家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从属于整体。但康德以更深邃的眼光指出“人是目的”，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与颠覆，他重新确立了个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灿烂一页的十六七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更是高举人的旗帜，张扬人的个性，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宗教神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中国的五四运动秉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同样也是伸张人的个性和人性，向封建专制主义、家族宗法和旧的伦理道德进行冲击，这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近代以来，哲学从本体论向人本主义的转向，都说明了人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人自身。从社会历史实践来看，封建专制主义往往总是和整体主义相联系的，它们总是预设了抽象的共同体，然后，要社会每个成员服从于这个共同体，向这个共同体做出牺牲，而它们就是这个共同体的代表。马克思曾指出，封建专制就是把人不当成人来看待，并把封建专制主义所维护的共同体斥之为虚幻的集体。他

从个人解放的角度出发，把人类历史分为三类形态：一类是自然经济阶段，在自然经济阶段，人的存在建立在人对人的依附性上；二是商品经济阶段，这时人的存在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但这时，人已摆脱了对人的依附性，有了独立自主性；而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把人从对人的依附性和对物的依附性中解放出来，从而使自己既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又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以每个人的自由解放为一切人自由解放的条件。由此，他设想并提出在对社会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是要建立一个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于个人与事物的个人能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我看来，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价值观的实质意味着对个人价值、个人地位、个人作用和个人尊严的肯定，同时也意味着个人的责任。它不能被理解为个人只是自顾自己，丝毫不顾及他人的唯我主义。也不意味着它不会为社会做出牺牲和贡献。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信奉和倡导个人主义哲学，但他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却被沙皇判处囚禁流放，就是一个例子。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价值观只是强调个人存在，个人价值、个人目的的正当性和无可替代性，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式在不妨害他人同样权利的情况下为自己生活的权利，从而拒绝个人成为他人目的的工具。从哲学上说，个人是实在的，集体只是个人的抽象，个人和集体、社会并不构成对立关系。如果每个个人的自由、幸福和权利都得到保障，这个社会便是和谐美好的。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价值观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精神是相通的。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以整体主义面目出现，宣称代表整体利益和意志，要求个人无条件奉献和牺牲的往往是最损人利己和别有用心，例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封建帝王也宣称他们为天下黎民百姓，但实际上是天下黎民百姓为了他，“以天下而奉一人”。整体主义只不过是他们蒙骗人民向他们无偿奉献和牺牲的似是而非的方便借口而已。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价值

观的确立将使那些想无偿占有他人成果的企图，失去道义上的正当性，使人意识到应该由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悲剧就是个人的永不被发现。胡适认为在中国“解放个人就是解放国家”，只有个人立，国家才能立。

(2) 市场经济制度。现代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分工和交换的自然结果，有分工就有交换，交换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经济制度，曾经被人为强制实行过的计划经济制度已被历史事实证明行不通。在世界各国过去曾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中，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明显地表现出低效率、浪费、官僚主义的通病，社会发展停滞落后。以至目前，大多也都在改弦更张，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改变，我国也是如此。按哈耶克的理论，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因为个人的需求是千变万化的，根本不可能有某个机构或个人能掌握如此繁杂和不断变动的需求。强行计划的结果，只能是扼杀不同的需求，使人的需求单一化，并造成供给不足，这也是造成那些国家普遍是短缺经济的原因之一。生产和需求的单一化，无疑，也扼杀了人的丰富多彩的个性发展需求并使社会生活单调化和平面化，当然，这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创新和发展。计划经济是以行政组织和行政命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一体化，把人捆绑在一个统一体中，使人失去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产生了对组织、机构、上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人堕落和失去个性。计划经济既与现代化经济生产背道而驰，又与马克思关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相违背，因此，哈耶克形象地将之称之为“通往奴役之路”；同时，计划经济也没有办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把个人的生产活动与个人的利益分割开来，客观上使人丧失了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使社会生产失去了动力。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与工人生产缺乏积极性，消极低效率是普遍的现象，也是人性的必然。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价格为信号，能自动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进行生产和调节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在布坎南看来，市场经济机制能使社会生产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经济是以产权的独立与分割为基础的，市场交换遵循“自愿平等，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马克思称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等级和宗法制度，“撕破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把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建立在独立、平等、自愿原则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人的第一步解放。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解放，人也就不可能获得社会关系和政治上的独立和解放。市场经济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而每个人的需求在市场需求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因而，市场经济满足了人的个性需要和个性发展的要求。

(3) 现代化社会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自由民主宪政制度。自由民主宪政制度是以宪法为国家、社会治理的最高根据，以保障组成社会的个人成员不可侵犯的自由与权利为宗旨的社会政治制度。它是“依法治国”，而不仅仅是“依法治国”；是法治，不是人治。“依法治国”，封建社会也有，封建社会也有法律，但那是统治者把“法”作为工具，用来治理和控制人民的，它不是用来保障社会成员的自由和权利，而是用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秩序的。“依法治国”，是以法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原则，它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和民主政治也并不都一样，自由民主宪政制度是在保障社会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目的，民主政治只是手段；而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有可能得到保障，也有可能得不到保障。缺乏宪法对人的自由和权利加以保障的民主政治，或直接大民主，也可能导致“暴民政治”，或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剥夺和压迫。自由民主宪政是建立在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分权与权力制衡

的机制，就不可能会产生自由与民主的政治体制。孟德斯鸠认为在集中的权力结构中，产生的只能是专制的体制。

在亨廷顿看来，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的演变，是由世袭制向威权主义，最后向民主政治过渡的渐进过程。世袭制的权力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它的“合法性”来源于血缘关系；威权主义的权力来源于武力强制，以暴力为后盾；而现代自由民主宪政制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它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自愿同意，它的权力正当性源于对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

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在政治机制上，还是个择优机制。自由民主宪政制度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安排，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使社会的任何层次的公共职务能向全社会公平开放，从而确保了社会政治精英人士的当选，以免庸才误国误民。也由于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权力构造，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因此，能得到最广泛的公民的监督和制约，所以，也能从根本上杜绝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现象。

一 思想篇

论思想解放与思想自由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 20 年是同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相联系的，是思想不断地突破旧的条条框框和禁区过程。从“凡是派”到姓资姓社、从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到市场经济的确立，无不伴随着思想上的激烈交锋和较量，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局面。

然而，回顾思想解放之艰难、曲折，在这过程中所付出的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又使人感到心情沉重。历史前进了，社会进步了，但一些思想先驱者却倒下了。从遇罗克到张志新、李莲九到顾准，从“反右”时期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的被打击、流放，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言获罪、以思想治罪，到改革开放时期的风风雨雨，都揭示了思想解放过程的艰难。当今天人们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与成果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了他们曾经有过的奋斗。更重要的是在纪念他们的时候，更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要建立一个保护思想自由的制度与法律。

中世纪的宗教思想专制悲剧如“文化大革命”居然在 20 世纪中下叶的中国大地上重演，是中国的幸，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国民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仍然任重而道远。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像斯大林那样破坏法制的做法，在美国就不可能发生。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正是众多民众的麻木不仁、愚昧纵容了悲剧的发生。因此，在思想解放过程中血的教训，应当引起全民族的反思。只有把思想自由的理念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公民的心中，扼杀

思想自由的行为才难以发生，才有最牢靠的保证。但遗憾的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人们经历了许多的以言获罪历史悲剧中，对这些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反思。

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制度对思想的专制与扼杀是非常残酷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位，防范人们的不满与反抗，统治者对人民进行了最严密的控制，其中就包括对思想的控制。不仅要人们行为上不能越位，而且思想上也不能越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定了种种包括“腹非罪”在内的思想言论罪。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三纲五常，仁信礼义”之说，则从社会道德思想层面，加强了对广大民众的控制。孔子之所以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万世师表，他的那一套儒家学说受到推崇，正是因为儒学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满足了统治者对人民控制的需要。因此，思想专制总是与政治专制联在一起的。

思想专制又是与一元化的绝对的真理观相联系的。这种观点认为真理是惟一的、绝对的、静止的。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真理，一切都可以从他们或老祖宗的论说里找到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个人迷信之风盛行的时期，任何的社会成果都首先被归结某某思想的伟大胜利，而写文章，做一切的工作，都要先从经典著作与最高指示中寻找根据。一切找不到或不符合上述言论的便是异端邪说，都不能允许与加以打击。与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如出一辙，因为上帝是最伟大的，能洞察一切。但上帝是虚构的，而人也不是上帝，所以对上帝的迷信与盲从的结果就是限制了人自身的发展。中世纪的黑暗早已了结，当政教分离之时，宗教便失去对世俗的统治，也无法再对人们实行思想的控制。宗教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纯粹的信仰与追随，不可能再对其他异教者进行强制和迫害，它们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本来信仰就应该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思想如果被强制那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与思想自由的侵犯了。

思想解放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是和思想自由相联系的。承认人思想的自由与权利，就是使思想可以不受约束与限制，可以自主地、自由地驰骋与飞翔，不再受外力的干预与迫害。思想的自由应当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马克思说思想是人类最美丽的花朵。思想也是人的尊严所在，思想是认识的源泉，也是创造的源泉。扼杀思想，就是扼杀认识，扼杀创造力。“文化大革命”思想专制的结果，搞个人迷信的结果，就是使 6 亿人民只用一个脑袋来思维，造成思想文化的大倒退；造成全国只有八部“样板戏”的极不正常的局面；造成整个社会的大倒退。“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正是世界经济快速腾飞的 10 年。然而，中国把 10 年都浪费在了内耗上，10 年期间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又拉大了许多，对中华民族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从思想解放与思想自由来说，思想自由是更为本质的东西，有了思想自由，根本不存在思想解放的问题。思想解放是在尚未达到思想自由，思想仍然受限制情况下的一定范围内的放宽，带有一点被允许的意味，仍然是有条件的，不彻底的。

当然，今天思想解放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们一些人讲思想解放，其实，仍然是在框框里谈思想解放，他们不是根据事实的本身，根据自己所具有的知识，独立自主的进行思考和判断，还是要习惯地从经典著作里，从政治权威人士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似乎只有这样才理直气壮。我们许多理论文章有着大量的引经据典，而引经据典不是以为参考，而是作为立论的根据。结论不是源于事实而是源于本本和上级，还是惟书惟上。政治权威凌驾于社会的思想、学术之上。这样，就压抑了思想的自由与真理的发现。

真正的思想解放乃是意味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意味着思想不受思想以外的任何事物的约束和压制，更不会因思想和言论获罪，意味着知识分子能独立自主的仅凭自己的社会良知发表各种

不同的社会见解和观点。

今天我们提出思想解放的问题，不能仅仅只满足于发出一些抽象的口号和倡导，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和落实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机制，切实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得以真正实现，使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不是基于某些人的恩赐，而是基于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今后，不再有人会因思想和言论获罪，而任何压制思想与言论自由的行为，都是违法与违宪的。

理性的精神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化就是世俗化和脱魅化的过程。世俗化就是人不断地把思考和关心的重心从宗教信仰方面转向自己当下的现实生活，脱魅化就是消除事物的神秘色彩，让它回复本来的面目。其实这也就是人的不断理性化的过程，纵观世界人类历史也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知识有限，惊讶于自然界的雷鸣电闪等自然现象并无法解释，便把它归结为超自然的神灵作用，这样就产生了最早的宗教意识。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多神教和一神教都反映了这种宗教神化的历史。宗教的式微是与人类科学知识的逐步增长同步的，随着各种神秘现象被科学知识所破解，神灵的光彩也就逐渐暗淡。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给宗教以致命的打击就是例证。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更是高扬人的旗帜，用人道主义向宗教神学发起冲击，从而把人的目光从神的彼岸拉回到人间现实的此岸，确立了人在现世生活的价值、地位与尊严，张扬人的个性，使人从各种宗教的、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不断摆脱束缚、追求个体自由的历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正是在理性和启蒙的光辉下，科学突飞猛进，社会迅速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合理化，而个人的个性与自由度日益张扬。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主要有儒、释、道三教，西汉以后，汉武帝为了巩固帝国的政治统治，认为需要统一国内的思想，便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

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故“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此后儒教便以官方学说占正统主流地位。儒教实际上是一种准宗教，它没有确定的教义和仪式，也缺乏超越情怀，而只是建立在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上下尊卑为等级原则的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与政治观。儒教的主要功用在于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地位和秩序，以使上下有别，各安其份。为了使这种社会统治秩序合法化和神圣化，便将世俗的王权与天道联系起来，董仲舒创造了“皇权神赋”、“天人感应”学说，赋予世俗王权以神的光环。家国同构、政教合一、以吏为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因此，中国的偶像崇拜更多地带有对国家政治权力迷信崇拜的特点，个人更多地受到的是家族、宗族、国家等社会关系的束缚。在以权力为本位的社会里，统治者具有神圣性，皇帝号称天子，口含天宪，替天行道，权力话语成为真理的代名词。加上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直观、感悟、综合，轻逻辑分析和推理，重感性轻理据，这些都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显得浪漫有余而理性精神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理性精神的不足使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更加艰难曲折。中国近代以来，义和团运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非理性宣泄、对宗教迷信的狂热；清王朝花钱赎买外资铁路后加以拆毁顽固拒绝新事物的愚蠢举动；中西文化的体用之争；建国后的“大跃进”中的“放卫星”和“刮共产风”运动，以及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对最高权力的迷信盲从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得以开展的社会群众心理基础）；凡此种种，皆狂热有余而理性不足。从打鸡针、喝鸡血到特异功能、伪气功；从求神拜佛到算命、看相、看风水的封建迷信；从水能变油的神话到彩票场上的万头攒动直至邪教法轮功的出现……从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中，都说明了国民素质之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欠缺。

理性精神的缺乏，源于无知愚昧及盲从心理，意味着缺乏独

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同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及其文化传统紧密联系的，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专制主义，奉行大一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经济上控制、政治上专制、文化上宰制，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王朝。历来的专制统治者都奉行愚民政策，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凡特立独行者，凡不符合统治者意愿的思想，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一律予以剿杀。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清的“腹非罪”、“文字狱”其对独立思想者的迫害、摧残可谓酷烈之至。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状况和恶劣的文化环境中，中国老百姓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养成了驯服盲从、惟上惟书（书也是统治者认可的经典）的习性，造成了怀疑精神与理性精神的欠缺。

理性精神的实质，就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不迷信盲从各种权威，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受各种其他因素的束缚和影响。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语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真”。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逐步完善，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进程，这些都为国民理性精神的培育和现代性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尚还落后，国民的文化素质还较低，而要消除悠久的封建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积淀，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国民的理性精神的成长，需要宽松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持久的努力。

跨越思想的断层

广东省的第九次党代会以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题确定了我省今后工作的中心和方向，这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正确决定。围绕着这个目标，人们提出了种种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当人们忙于从经济层面和制度层面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时，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了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首先还需要人的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这就好像要建造大厦，首先需要先有一张蓝图的道理一样简单。没有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可以说，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要做到却很不容易。无论从中国的近代史还是现代史来看。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阻碍最大的，是思想观念的保守、僵化和落后。

中国有长达 5000 年的文明史，在历史上也曾经辉煌过。但近代以来，由于故步自封、闭塞僵化，当西方开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而发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国就显得落后了。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是在外部世界现代化国家的示范效应与刺激下展开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器物到制度到思想文化的过程。而究其根本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可惜的是，对现代化的这种认识，并未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相反，中国传统上无谓的“体用之争”、“中西之争”仍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续不断地纠缠着国人的心神，浪费着人们的时间，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理性的思考，用意识形态的话语代替科学的判断，用浪漫主义

理想代替严峻的现实。最终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社会发展严重受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屡屡中断甚至倒退。在这方面，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有过深刻的教训的。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宁种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端思想；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用之争”的新的变种。有些人不是从全民族长远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用狭隘的、僵化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变革。这种保守的思想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之强大，足以扼杀改革家的努力。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智地提出“三个有利于”和“不争论”的思想，号召人们大胆地干、大胆地试，才为改革开放赢得了时间。

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中国加入了WTO，中国正进入更加全面的制度创新和加速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阶段。省的党九代会也提出了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要实现我省现代化目标，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和障碍。它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方面的不适应，而首先是思想观念方面的不适应。一些人没有看到，同一百多年相比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仍然用机械、僵化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不是使理论服从实践、服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把理论神圣化、绝对化、封闭化，使理论成为脱离社会现实需要的具有自满自足意义的东西；他们不是从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实践为标准，发展和创新理论，而是用过去的不能正确理解的理论来扼发展中的社会实践，对社会发展中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挑挑拣拣；一些人的脚已经踏进市场经济里，但头脑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仍然习惯于过去的思维和做法。思想和理论不能做到与时俱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和需要。在社会上，宗教迷信有蔓延之势，各种非理性思想此起彼伏。凡